

论马克思的“物”

张东辉 李春晓

[摘要] 马克思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对象化意义上的“物”，这种“物”通常被马克思称为“对象”。青年马克思发展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对象化理论，进一步从实践的角度将“物”理解为对象。第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这种“物”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形式出现，表现为社会关系。资本是由商品的价值构成的，其物性表现为“价值实体”。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非物化、抽象化。第三，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物”，这种“物”呈现为人们物质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历史总体。诸物的普遍联系构成“物”的总体，其实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世界的普遍交往。就马克思思想而言，“物”的这三层含义呈现出个别（对象）、特殊（关系）和普遍（总体）的复合性关系。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从唯物主义的角度阐释了“物”和“物的世界”，走进了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深处。

[关键词] 物 对象 商品 资本 总体

[中图分类号] B03

作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能经验到的东西，“物”再普通不过了。然而，一旦我们严肃地思考“物”，就会发现它的内涵丰富而复杂。马克思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对“物”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看，他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物”，在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呈现出一个宏富广博的“物”的世界。但时至今日，学界对“物”的理解仍未尽其意。有些学者未加反思地从“物”本身的直接存在去认识“物”；还有一些学者虽外在地给“物”冠以“实践”的语境，却并未真正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物”。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重审马克思的“物”的思想。

需要说明，本文论述的“物”是马克思“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意义上

的“物”(Materie)。但仅从德文看,“Materie”不能确切地传递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含义,因为“Materialismus”中的词根“Materie”既不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所探讨的“质料”,也不是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物质”。马克思的“Materie”更多地具有哲学和社会的属性,更接近于“Ding”(事物)和“Sache”(事情)以及两者的综合。总体而言,“物”既指感性存在的自然事物和抽象存在的“价值实体”,也指由人类实践活动参与其中的整个社会—历史总体。基于德文与中文的性质及差异,本文认为,中文概念“物”可以指代马克思“唯物主义”中的词根“Materie”。本文从三个层面论述马克思的“物”: (1) 对象化意义上的“物”,这种“物”通常被马克思称为“对象”; (2) 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这种“物”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形式出现; (3) 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物”,这种“物”呈现为人们物质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历史总体。

一 作为“对象”的“物”

如果从改造世界的“实践”角度来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要义,那么“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就是马克思的“物”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实践”的基本含义是指人的对象化的活动,亦即将主观事物(观念)变成客观事物(现实)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对“物”的理解始终都没有抛弃作为“对象”的“物”这一层面。只是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中,“物”被赋予了属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尤其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情境中,“物”还被强加了诸多异化的物性。无论是马克思哲学的人本学语境中的实践活动,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亦或是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商品生产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对象化活动。对象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因此,对象化贯穿马克思思想的始终。可以说,不理解青年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就不能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

青年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感性人本学的影响,尤其在“物”的对象化方面,这种影响是显著的。因此,我们需要先来简要论述费尔巴哈的感性人本学。费尔巴哈的感性人本学主要强调两个核心要素: (1) 感性(或自然); (2) 对象化(或异化)。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感性的、自然的存在是首要的、先在的和直接的存在。在感性的自然界中生活着感性的人,而感性的人具有理智本质(知)、道德本质(意)和心的本质(情)。在《基督教的本质》的“第二版序言”中,费尔巴哈开宗明义地宣称自己是“一个精神上的自然科学家”,要研究建立在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本质、感觉”^①基础上的“新哲学”。(参见费尔巴哈,1984年b,

^① 在中文译本中,此处的“本质”原译为“实质”,现根据德文原文“Wesen”加以改译。“Wesen”虽有“存在者、存在物”的含义,但未有“实质”的含义。

第 14—15 页) 在概述宗教的本质时, 费尔巴哈提出了著名的“主谓颠倒”的命题, 指出属神的存在者的谓词是属人的、感性的规定, 而有什么样的谓词, 才有什么样的主词。他强调, 感性存在才是首要的存在: “只有在感性之中, 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中, 才有可能让无限的、确实无限的、富有规定的存在者存在。”(同上, 第 55 页) 我们可以称费尔巴哈的这种主张为“感性论”或“自然主义”。

在感性人本学之外, 对象化理论也构成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核心观点, 它揭示了人类如何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为对象, 并通过对象反观自身的过程。换言之, 对象化的过程就是人通过自己的本质“塑造”对象的过程。他说: “如果你毫无音乐欣赏能力, 那末, 即使是最优美的音乐, 你也只把它当作耳边呼呼的风声, 只当作足下潺潺的溪声。”(同上, 第 38 页) 在分析宗教的本质时, 这一论点尤为突出。费尔巴哈指出: “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 然后, 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就是宗教之秘密。”(同上, 第 63 页) 当然, 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与对象化理论也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 他强调感性自然是直接的、先在的现实; 另一方面, 他又将自然对象视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产物。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可以明显看到费尔巴哈感性人本学的这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一方面, 青年马克思主张自然界是业已存在的材料和条件, “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 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第 158 页)。他还强调, 自然界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上, 第 161 页) 但另一方面, 马克思又着重强调“物”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 提出了“人本学的自然界”概念, 认为自然界并非是独立于人、异于人的客观实在, 而是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参见同上, 第 193 页) 自然界通过人的感性活动, 逐步转变为符合人的目的的现实的自然界。在这一过程中, 自然界展现出了人的本质力量。

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 成为人的现实, 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 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同上, 第 190—191 页)

马克思在这里论述对象化时, 列举了费尔巴哈也举过的音乐感的例子。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对象化活动主要强调从理论的或直观的形式静态地对“物”加以塑造, 那么马克思则从实践的角度发展了这种对象化理论。他把对象化进一步理解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改造无机界”(同上, 第 162 页), “通过这种生产, 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同上, 第 163 页)。

马克思进而指出, 随着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展开, 不仅人的本质得到了发展,

现代工业和世界历史也得到了发展。历史的发展就是人通过劳动实现自身本质的过程，也是自然界成为人化自然的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内在本性，而是在人与自然界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展开和实现的。人的对象化过程意味着人通过实践活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将自然界转化为反映人的本质的对象。这一过程并非是单向的，因为人不仅设定对象，也在与对象的交互关系中被对象所设定，从而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历史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进程，更是人与自然界在互动中创造和显现人的本质的过程，即“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同上，第192页）。在这个过程中，物质文明作为一种“对象”，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从实践的维度拓展了费尔巴哈的对象化理论，解决了费尔巴哈对象化理论的上述矛盾。表面上看，在马克思这里同样存在一种悖谬：一方面，对象是因我而被设定的，“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同上，第191页）；另一方面，对象又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同上，第209页）。但是，因为有了实践和历史的维度，这种悖谬在马克思这里就不再是悖谬，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哲理。“人”是“物的人”，“物”是“人的物”。正是在如此这般的星球和自然界中，才孕育出了人类的生命。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通过劳动和生产改变自然环境，同时也改变自身，从而使得人与自然达成了统一。通过实践，“物”被转化为“社会性存在物”。这一转变不仅彰显了“物”的社会属性，更深刻反映了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在分析“物”的社会性时指出，对象是“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同上，第190页）。这种对象性既体现了人“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上，第187页），也体现了“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同上，第187页）。换言之，对象之所以具有社会性，是因为它承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体现的社会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言：“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同上，第190页）进而言之，马克思认为，通过迄今为止的生产活动，人不仅赋予“物”以社会性，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确立了自身的社会性。这种转变创造了具有丰富、全面且深刻感觉的人，更使人成为社会存在物。因此，马克思强调：“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同上，第190页）马克思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性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彻底统一了起来，这是马克思继承并发展费尔巴哈感性人本学的结果。

由于费尔巴哈没有进一步看到实践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作用，而是始终停留于感性直观，所以他就只能在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费尔巴哈试图打破以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创建一门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新哲学。（参见费尔巴哈，1984年a，第111页）然而，费尔巴哈的新哲学终究没能超越传统形而上学范式，仍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模式中兜兜转转。而青年马克思则已经昭示着

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这就是以实践为标志的、突破主客二分的新唯物主义的出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9页）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才能够在接下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展开系统性的批判。

二 作为“关系”的“物”

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他开始创立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这样的语境下，“物”就更加远离纯粹的自然物或作为对象的感性存在，成为人类生产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产物。就像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原子式个体有其得以存在的社会—历史前提一样，作为对象的“物”也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情景，而必定从属于特定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在《资本论》的语境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看，现实的“物”就是商品、货币和资本。这样一来，我们就要从个别性意义上的作为“对象”的“物”转而考察特殊性意义上的作为“关系”的“物”。

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商品化过程及其对社会关系的深远影响。在资本主义体系里，“物”被普遍商品化，转变为“社会性存在物”。在这一过程中，“物”不再仅仅拥有自然的使用价值，还被赋予了具有社会属性的价值，成为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每一件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都深深嵌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即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之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页）

这揭示了商品交换的本质：商品不仅仅是单一劳动的物化，它还表现了生产者与社会总劳动的关联。当我们在交换商品时，实际上是通过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来隐性地展现生产者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在这一过程中，物的交换仅仅是交换的表面现象，它隐藏着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隐藏着生产者与总劳动之间的社会联系。

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是货币形式。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了商品世界中能够衡量一切价值的唯一的、真正的“物”。由此，货币也彻底以“物的关系”掩盖

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当劳动力沦为商品，并可用货币加以购买和消费时，资本就出现了。“物”的表现形式也就从商品和货币发展成为资本。

因此，资本不是外在的物质生产要素，它在更深层次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在本质上并非物质的生产要素总和，它通过特定社会关系在“物”上体现出来。“物”被赋予了社会性质，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承担了资本增殖和再生产的任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2页）更进一步讲，资本是社会权力的集中表现，资本的本质在于对劳动及其成果的支配和剥削，“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30页）。马克思还强调，资本的运行过程使得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资本的生产体制之中，资本主义社会是被资本权力总体控制的社会结构。资本的权力“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页）。资本不仅支配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还扩展到政治权力的生产、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以及个人生活的全面物化。马克思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形容资本逻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1页）马克思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同上，第31—32页），资本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综上所述，我们简要阐述了作为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物”，即非物的“资本”。然而，资本这种“非物”，显然同时又是“物”。资本的物性，从存在论上表现为资本向“价值实体”的异化。资本本质上由商品的交换价值所构成，不是作为某个具体商品而存在，而是所有商品共同的“价值实体”。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它通过雇佣劳动力来为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自我增殖。因此，资本在“物”的形式上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且包括劳动力商品，这是一种特殊的“物”。资本是“物”，同时在资本眼里，劳动力也是“物”。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剥夺了工人对劳动成果的所有权，同时将工人的社会地位降低为生产资本增殖的工具。

从可能性来说，同资本相对立的是所有劳动的总体，而究竟哪一种劳动同资本相对立则是偶然的事情。……只要是劳动，并且作为劳动对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就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4页）

如此一来，“物”就呈现出一种悖谬：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与之打交道的物，竟然既是“物”，又不是“物”。我们貌似是在与实在的、感性的和真确的“物”打

交道，但在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这样的纯粹感性存在其实并不存在。面对真实而冷酷的价值实体，“物”反而成了我们幻想和抽象出来的东西，成了虚幻的东西。因为任何“物”都是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其实质乃是商品或资本。日常之物的交换价值或价值增殖能力取代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成为物之为物的本质。在外观上，“物”还是物，但在实质上，“物”却是资本。因此，“物的世界”表现出荒谬的颠倒错乱。真实存在的“物”被人们视而不见，虚幻不实的“价值”却成了实体。资本不是“物”，但却又是“物”，甚至胜似“物”。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物”的“非物化”体现出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发展。“物的世界”在这里表现为从自然物到商品与货币再到资本的演进。资本的形成标志着“物”的总体性发展的巅峰状态。资本既是“物”的最抽象存在形式，也是“物”的最充分具体发展的结果。可以说，资本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抽象与具体之间辩证关系的绝佳例证：“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8页）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看，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这种颠倒的现实，即“物”与“非物”、实在与抽象的颠倒错乱，因此提出了拜物教批判，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他通过分析“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三种形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抽象”对人的统治。作为拜物教的最尖锐、最普遍的完成形式，资本拜物教超越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所形成的“物的关系”，竭力省去生产和流通环节，企图直接实现G-G'，乃至切断了具体劳动与财富之间的联系，从而将“抽象统治”发展到了极致。

那么，真正的“物”究竟何在？其实，现实生活中的“物”还是它本来的样子。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物”丧失了自身的物性，仅以它的价值形式获得自身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通过各种“物”表现出来，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了“物”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性质。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才能被解放出来，才能还原“物”的本性。

三 作为“总体”的“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举的“樱桃树”的例子，可以说明“作为对象的物”与“作为资本的物”的区别，以此为基础可以导出“作为总体的物”。

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

首先，作为对象的樱桃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1）从费尔巴哈对象化的意义上看，樱桃树是感性直观的对象，是认知主体基于自身的本质特性和认知条件而塑造出来的对象；（2）在青年马克思实践的对象化意义上，樱桃树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们以前“移植”到巴伐利亚州来的“物”。其中，第2个方面是马克思在举这个例子时所强调的重点，也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所缺乏的方面。马克思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同上，第529页）其次，作为资本的樱桃树，它的物理存在和物质属性已被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抽象逻辑所吞噬，转而成为资本家经商牟利的载体，即“不变资本”。樱桃树固然还是樱桃树，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在资本家的眼里，它仅仅只是资本增殖的中介物。也唯独为了资本增殖，它才被商人不辞劳苦地从外地移植到巴伐利亚州，成为消费者和观赏者眼中的樱桃树。最后，樱桃树的背后是整个物质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历史总体。樱桃树并非只是孤立的樱桃树，它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以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全部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前提的。没有如此这般的社会历史条件，断然不会在当时的巴伐利亚州出现樱桃树。因此，樱桃树所牵引出的乃是整个社会—历史总体，是整个“物的世界”。

我们现在就要来探讨这个作为社会—历史总体的“物”的世界。斯密在关于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中“物”的联系的问题上指出，“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是人类的普遍倾向。（参见斯密，第12页）可见，正是人类的普遍倾向，促使诸物处于流通、交易和联系的状态。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同上，第14页）

这段经典表述生动诠释了现代商业社会如何在需要及其满足的推动下形成了一个万物联通的“需要的体系”。每个人在为自己劳动和自我享受的同时，也在为他人劳动并满足他人的享受。甚至只有为他人劳动并满足他人的享受时，我们才能实现为自己劳动和自我享受。因此，“作为总体的物”就是人们从事劳动和交换而形成的一个生产生活的物质体系，一个自然的、自发的、自由的市场体系。

马克思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了作为普遍联系的社会性总体的“物”。在黑格尔的影响下，马克思用“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取代了斯密的“商业社会”，并用它来指代“物的总体”。

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2—583页）

“物”是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社会总体，这个总体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生活中，在劳动、交换和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万物互联所表现的乃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世界的普遍交往。就自在的事物本身而言（如果有的话），其实谈不上它们是否构成“总体”。因为从休谟和康德的角度看，我们日常所说的“物”只是主体性的“经验”，是主体参与和建构的结果。从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来看，“对象、现实和感性”从来都不是离开人而存在的东西，尽管它们在自然主义的意义上客观存在，但它们分别在直观和实践中必然被主观地加以塑造。至于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在德国观念论看来，是由逻辑范畴设定起来的。我们可以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关系”诸范畴和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论”诸范畴中看到这种联系的具体表述。但马克思对此批评道，在这些哲学家那里，世界上的事物不过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参见同上，第600页）诸物的真正联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尤其是在商业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因此，“万物互联”反映的是人们普遍交往的社会关系。“物的总体”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是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总和，在其中，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马克思称之为“生活”和“环境”。他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同上，第525页），并特别强调这个“物”的世界是一个“总和”，即“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同上，第545页）。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同上，第544—545页）

“物的总体”是决定历史发展和意识形态形成的根本力量。马克思强调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从而揭示了“物的总体”与人类的交互作用。

更进一步，马克思不仅从物质生产和普遍交往的角度揭示了“物的总体”的基本样态，而且还阐释了“物的总体”与世界市场以及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联。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确立了现代社会的“物的总体”。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同上，第566页）

马克思又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

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他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强调：

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

与此同时，“作为总体的物”的世界随着生产力的改进和交通的便利，发展成为世界市场，并有了历史的维度。马克思指出，“物的总体”在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实现了诸个别的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重要转变，从而拥有了世界史的意义。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541页）

需要强调的是，诸物构成普遍联系的“物的总体”，就马克思当时所处的英国发达资本主义业已完成的形态而言，就是到那时为止业已完成的“资本总体”。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资本之所以是总体性的，是因为它永不停息地运动和增殖，并体现出强大的吸纳性。资本是运动的抽象，它永远处于流变和运动之中，经历不断的循环和增殖，并始终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21—122页）资本吸纳一切可以吸纳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来为自身的增殖服务。同时，资本的总体性还表现在，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真正的主体，它使一切要素从属于自身，甚至可以创造自己所需要的器官以壮大自己。

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7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物质世界及其运作逻辑，特别是资本如何通过其背后不断的循环、流通和分割等总体社会条件来实现自身的扩展与增殖。《资本论》的第1卷、第2卷和第3卷在分析层次和实现条件上相互补充，共同呈现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社会历史性前提。

对此，可以设想存在这样一个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总体，它构成了诸物得以存在和显现的基底。但是，特定的阶层和阶级、特定的群体和特定的个人因其各自的谋生方式、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而在这个作为总体的物质世界中居于各不相同的中心点，并在关联度和影响力上由近及远、逐级递减地扩散开

去。每个人都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因其独特的实践活动，拥有以其自身为中心点的生活世界。这样一来，这个“物的总体”就发生了不计其数的、具有不同中心点的诸多总体的叠加，我们所处的这个“物的总体”就会呈现出非常复杂和多元的特征和维度。当然，马克思也深刻地洞察到资本的增殖和流通带来的“物”的总体化所必然导致的异化。关于这一问题，兹不赘述。

结 语

马克思青年时期在费尔巴哈感性人本学的影响下走向了唯物主义，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开辟了“物”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全新维度，揭示了“物”作为“对象”、作为“关系”以及作为“总体”的丰富内涵。马克思对“物”的理解是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主要集中在“物”的对象化层面，借鉴并发展了费尔巴哈侧重感性直观的对象化理论，从实践的角度将“物”理解为“对象”。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深入展开，特别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物”在“社会关系”层面的意涵，即在这个意义上的“物”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形式出现的。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马克思将“物”提升为物质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历史总体。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作为“资本”和作为“总体”的“物”进行了更加深刻的阐明。“物”的这三层含义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呈现出个别（对象）、特殊（关系）与普遍（总体）的辩证统一，展现了“物”的不同维度。

马克思从人类实践活动出发，运用唯物主义视角深刻阐释了“物”及其所构成的“物的世界”，并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逻辑。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刻诠释了“物”如何作为物质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历史总体，构成了人们所处时代的物质前提，真正走进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深处。

参考文献

- 费尔巴哈，1984年a：《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
- 1984年b：《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 斯密，1972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贾红莲 王惠民